

論臺港文學中後社運書寫的歷史記憶與創傷再現： 以《樹的憂鬱》、《變成的人》為例^{*}

余銘湘^{**}

摘 要

2014年太陽花學運與2019年反送中運動，是近年來臺灣與香港兩地社會運動的重要轉捩點，不僅激發了年輕世代的政治意識，也深刻影響文學的創作趨勢。當社會運動結束以後，許多書寫轉向運動「之後」的生命經驗，聚焦於創傷記憶、流亡遷徙、世代斷裂與身份重構等主題，逐步形塑出「後社運書寫」的敘事風貌，尤其是在運動過後，「回顧」與「想像未來」之外，「當下」作為敘述維度漸為重要，但在現有研究中尚少被充分探討。

對此，本文即以梁莉姿的《樹的憂鬱》與許恩恩的《變成的人》為主要文本，進行討論，探討兩地文學如何在「後社運」語境中重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進而展現時代精神與文化書寫的多重面貌，以及如何通過時間策略、語言斷裂與敘述形式，重構運動「之後」的創傷經驗、世代記憶與身份認同；同時，兩部作品同樣思考於：當運動結束，理想破碎，個體將如何重新定位自身？而文學，又如何承接這些未竟的情感與歷史？故之，本文旨在揭示文學如何作為一種倫理書寫的實踐，進而展現書寫內部的創傷再現、世代之間的記憶，以及臺港之間政治與文化連結的想像，從而開展出一條更具批判性與跨地域視野的「後社運文學」路徑。

關鍵詞：臺港文學、後社運書寫、歷史記憶、創傷再現、臺港共同體

^{*} 論文初稿曾於「台港研究新視野暨《八方文藝叢刊》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須文蔚教授、評論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鍾秩維教授提供相關意見，後經兩位匿名審查人之細心閱讀並慷慨給予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收稿日期：114.08.29；通過刊登日期：114.10.31)

一、前言

2014年臺灣的太陽花運動與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作為廿一世紀臺港地區具代表性的兩場社會運動，不僅改變了地方政治格局，也深刻影響了文學、文化與身分認同的表達。這兩場運動雖在地理上隔海相望，卻在語言、文化與歷史中緊密纏繞，使得「臺港關係」與「社運書寫」成為近年來重要的書寫議題。運動退場之後，運動參與者與旁觀者同樣面臨心理創傷、價值幻滅與現實調適的難題。隨著現實逐步收緊、社會氛圍轉變，許多創作者開始轉向內在精神層面的探問與紀錄，書寫那些無法即刻言說的殘留記憶、未竟哀悼與潛伏痛楚，誠如沐羽《煙街》、¹蘇朗欣《觀火》、²林子玄《傷兵不在街頭》³等。這些作品不同於直接再現抗爭場面的文學，而是更為隱微、碎裂、反覆的創傷書寫，呈現出後社會運動時代的精神面貌。

2014年太陽花運動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 程序不透明的抗爭，不僅成功阻擋立法院草案通過，也喚醒臺灣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與制度監督的意識。美國學者吳冠昇指出，太陽花運動之所以能夠達成政策上的實質影響，一大關鍵在於運動期間公共輿論的迅速累積與民意轉變，這使得部分政治菁英不得不與運動力量結盟，以回應社會壓力。⁴同時，何明修和林宗弘曾撰文探討太陽花運動如何作為香港「兩傘運動」的先驅或鏡像之一，其策略、動員型態與佔領公眾空間的方式，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中被借鑑與適應。⁵這些承繼與傳播，使得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青年與社會運動者，在動員機制、行動結構與社群媒體運用上，顯著吸收了來自臺灣的實踐經驗。例如，運動者傾向使用佔領與集會形式、在公共空間建立領導與溝通機制、抗爭中的象徵與視覺文化，以及強調政策透明性與回應性。雖然兩地政治制度與法律結構不同，但太陽花運動提供了一套可以被模仿與適應的框架，這一框架幫助香港反送中運動更快速動員、擴散訴

¹ 沐羽，《煙街》（台北：木馬文化，2022）。

² 蘇朗欣，《觀火》（台北：木馬文化，2024）。

³ 林子玄、陳湘好，《傷兵不在街頭》（台北：木馬文化，2024）。

⁴ Charles K. S. Wu, "How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3 (2019.11), pp. 289-307.

⁵ Ho, Ming-sho and Thung-Hong Lin, (2019), "The Power of Sunflower: The Origin and the Impact of Taiwan's Protest against Free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ivil Resistance and Contentious Space in Hong Kong*, eds. by Ngok Ma and Edmund W. Cheng.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p. 279-310.

求與凝聚共同體認同。由此，太陽花運動透過改變民意、創造可操作的抗爭模式，以及推動年輕世代政治參與，成為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在策略與意識型態上的重要啟發來源；先後三場大型社會運動之間存在一種間接但清晰的傳承關係，使香港的抗爭者能在既有經驗的基礎上，更迅速地應對北京與香港政府間的權力張力與控制策略。

對此，本文以「後社運書寫」作為討論主軸，其一太陽花運動和反國教運動的對照已有不少研究，其二近年來社運書寫已成為台灣的熱門書寫主題，不單是台灣社運，更包含了香港社運的書寫，尤其是此一批作家作品均牽涉到台港兩地的背景與角色，以及藉由回顧「過去」的社運記憶，對「現在」造成種種的創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梁莉姿《樹的憂鬱》（2023）和許恩恩《變成的人》（2024）皆以「運動以後」作為書寫時間軸，而並非書寫「運動當下」，二人同樣企圖重思社會運動結束以後「尚未被理解的經驗」，尤其是許恩恩在動筆寫下第一篇後，讀到梁莉姿《日常運動》，並為其帶來滿大的鼓舞。⁶前者憑藉該作品不但入圍第23屆「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劃，其後更榮獲第48屆文學圖書類金鼎獎。小說以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後的時代背景為核心，描繪港人因流亡、求學、移民或婚姻等原因遷居臺灣後的心理狀態與文化適應。透過多位角色的視角，探討流離者在異地面對的文化衝突、內在歉疚與政治分歧等議題，以及角色們在臺灣的生活中，經歷了格格不入與尋求融入的掙扎，呈現出流亡者的複雜心理，甚至港人在臺的日常與記憶錯置，呈現異地創傷的情感延遲與語言困境；其中得獎評語提到「描述臺港兩地人們的日常與心境，細寫個人留在香港或移居異地的諸種考量與艱難選擇，……織入一篇篇流離寓言中，暗示那些歷史烽火、運動遺緒並未化成灰燼，仍持續燒灼不同世代的港人的心。」⁷

至於，後者則獲得2024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蓓蕾獎，小說以2014年太陽花運動為背景，探討了參與者在運動前後的心理變化和生活轉折。小說的敘事結構橫跨不同時空，從2013年到2022年，描繪了主角們在社會運動中的經歷，以及他們在運動結束後的生活狀態。作者以社會學的視角，深入探討了社會運動對個人身份認同的影響，並呈現出角色們在運動後的心理掙扎與成長。《變成的人》不僅是一部關於

⁶ 張馨文，〈從社運組織者及研究者，變成寫小說的人：訪《變成的人》許恩恩〉（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631>，檢索日期：2025年5月10日。）

⁷ 虛詞編輯部，〈廖偉棠《劫後書》、梁莉姿《樹的憂鬱》榮獲台灣第48屆文學圖書類金鼎獎〉（虛詞：<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4748.html>，檢索日期：2025年5月10日。）

社會運動的小說，更呈現出社會運動參與者在運動後的生活狀態，並反思社會運動對個人生命的影響；其中評審意見提到「太陽花世代目前躍上舞臺的以男性為多，許恩恩這本小說以女性視角，……以『去或留』，『內與外』的衝突為主，分別討論臺港關聯、性別政治，女性情誼以及在運動中產生的溫柔與暴動，心悸與離散。」⁸由此可見，兩部小說所展現的，不只是事件之後的敘述，更是對未竟歷史的記憶再現，藉由後社運書寫進行討論，並非僅止於歷史紀錄，而是一種試圖在裂縫中重建認同、轉化創傷的文學實踐。

目前關於「社運書寫」的研究裡，在臺灣主要以賴香吟、邱妙津為主，其中黃文倩〈唯情與不潔：台灣解嚴後女性知識份子的社運敘事與主體困境——以邱妙津〈寂寞的群眾〉、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為例〉一文，明確將邱妙津的〈寂寞的群眾〉和賴香吟的〈翻譯者〉定義為社運小說。這些作品被視為探討臺灣解嚴後女性知識分子參與社會運動及其所面臨的主體與敘事困境。其中〈寂寞的群眾〉描寫了女性知識分子的成長，但同時呈現了她們受制於戰後臺灣著重個人情感與道德的文化制約，慣於以「唯情」或真誠來認識政治現實。這種思維導致思維上以原則性取代歷史複雜性。然而，作品的進步性在於主人公在對這種抽象性感到高度不安與矛盾下，仍選擇繼續投入社運；而〈翻譯者〉則進一步探討了在社會運動與革命理想退燒後，人際和兩性解放所面臨的「新的歷史困難」。作品中展現了當時女性知識分子唯心的自我安慰與自苦限制的典型性，這體現在主人公的「無言」敘事中。兩篇小說共同敏銳地投射出解嚴後臺灣女性知識分子在參與社會和安頓情感上的困難，這被視為臺灣現代轉型過程中的認識論與倫理學困難。⁹此外，謝樺瑩〈肉身其中的倖存者——析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それから》〉一文則主要從倖存、創傷與哀悼的角度分析〈翻譯者〉與《其後》，雖然提及前行研究可能涉及「學運世代」、「國族」等議題，但其核心內容並非直接描寫或分析社會運動本身，而是聚焦於創傷後的心理狀態、失語以及透過書寫進行的生命翻譯與哀悼。¹⁰

⁸ 〈2024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完整得獎名單與評語〉平路《夢魂之地》榮獲金典獎年度大獎〈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890>，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⁹ 黃文倩，〈唯情與不潔：台灣解嚴後女性知識份子的社運敘事與主體困境——以邱妙津〈寂寞的群眾〉、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為例〉，《第十三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 年 12 月），頁 398-431。

¹⁰ 謝樺瑩，〈肉身其中的倖存者——析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それから》〉，《雲漢學刊》第 46 期（2023 年 10 月），頁 110-143。

另外，以香港反送中運動為題的研究，主要有探討政治壓力與限制如何影響流行曲、文學及推理小說等不同媒介的創作與表達，並展現出創作者與閱聽眾如何回應社會變革和創傷。首先，周嘉浩〈傷痕文學視角下的後社運香港流行曲：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一文，探討後社運時期香港流行曲如何以傷痕文學手法表達創傷。面對政治壓力與審查，創作者透過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傳遞訊息，既為自保，也反映心理創傷。流行曲在高度商業化與中國市場考量下，其表達更為隱晦，卻仍成為建構香港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並涉及哀悼的政治意涵；¹¹其次，賴展堂〈冤魂政治：以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文學寫作為例〉主要探討香港社運脈絡下的冤魂政治，指出六四與反修例運動中的哀悼是政治異議的表達方式。死者被視為冤魂，其再現揭露被掩蓋的真相。透過符號與文學，冤魂獲得主體性，並需讀者想像與共感來激活，形成跨主體倫理，共同記憶創傷與編織死後生命；¹²最後，黃宗潔〈躁鬱的城市：當代香港推理小說的社會性及其「雙重轉譯」〉則探討當代香港推理小說如何在動盪政治中以虛構記錄歷史、反映焦慮。2019年反送中運動成為創作起點，小說藉雙重轉譯讓香港被看見。作品在後社運時期呈現警察角色的兩極形象，反映對真相與正義的價值追求。推理小說遂成為記憶歷史、抵抗遺忘的文化實踐。¹³

簡言之，上述文章皆強調文學在地回應創傷與記憶建構，聚焦於社運背景下的創作如何面對創傷、哀悼與記憶建構，無論是臺灣女性知識分子的敘事困境，或香港在政治壓力中以隱晦方式傳遞真相，皆展現文學與文化作品對社會變動的敏感回應與記憶保存功能；惟上述文章所討論的作品均以單一地方為主，而太陽花運動與反送中運動之間本存在著承先啓後的意義。對此，本文試圖進一步比較臺港經驗，關注運動後的共同體重構與跨地域文學對話，突顯其對話性在於由內省轉向跨境連結，並提供後社運文學新的比較與理論視野，以梁莉姿《樹的憂鬱》與許恩恩《變成的人》為討論對象，探討臺港文學中「後社運書寫」的敘述與意義。自2014年太陽花學運，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臺港兩地青年在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¹¹ 周嘉浩，〈傷痕文學視角下的後社運香港流行曲：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臺灣傳播學刊》第45期（2024年6月），頁109-145。

¹² 賴展堂，〈冤魂政治：以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文學寫作為例〉，《文化研究季刊》第178期（2022年7月），頁69-96。

¹³ 黃宗潔，〈躁鬱的城市：當代香港推理小說的社會性及其「雙重轉譯」〉，《淡江中文學報》第43期（2020年12月），頁239-273。

亦在運動結束後面臨理想幻滅、身份錯置與創傷記憶的深層挑戰。這些經驗不僅改變了個人命運和重塑了集體記憶與文學敘事，也是對運動事件的延續性回應，更是對以往的共同體想像論調進行再思與重構，進而冀以開拓臺港跨地域文學對話的可能性，並為後社運書寫研究提供新的討論視角。

二、「世代」的失落

在討論梁莉姿《樹的憂鬱》與許恩恩《變成的人》時，無法忽視其中深刻展現出的「世代感」與「記憶傳承」，這兩部小說不但是創傷後的情感紀錄，也是政治與社會變遷的精神面貌。《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皆將焦點放在運動過後的青年和中年，關注其在面對現實壓力與理想幻滅時的掙扎與轉變，尤其是社會運動中最活躍的是青年世代，他們往往在運動之中扮演主導角色。在《樹的憂鬱》和《變成的人》中，「世代」問題是兩位作家的反思核心之一，分別探討了世代之間對移民、身份認同及歷史變革的不同體會，並以個體如何在共同歷史經驗中找到自我定位。首先，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對世代問題，其認為「世代」是建立在相似的「世代定位」（generation location）基礎上，即意味著處於同一歷史社會進程中的個體，由於出生年代相近，在社會整體中佔據了相似的位置。然而，僅僅是時間上的同期性不足以形成世代單位。關鍵在於他們能夠作為一個整合的群體參與共同的經驗。¹⁴社會變革和動蕩是促使同齡人形成具體聯繫、成為現實世代的關鍵。世代單位則是在這個共同參與和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同一個擁有共同命運的「現實世代」（generation as actuality）內部，會根據成員加工其共同經驗的不同具體方式形成不同的「世代單元」（generation unit）。¹⁵這些單元通過對共同經驗的一致性反應和特定的親和力來區分。世代單元的形成通常在一個具體的、緊密的群體中產生，但其影響力能超出原創群體，因為它能夠充分地表達整個世代特定「定位」的典型經驗，¹⁶而社會文化變革速度越快，特定世代定位群體通過產生自己的內在目的來應對變化情境的可能性就越大。

¹⁴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pp. 290-291.

¹⁵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303-304.

¹⁶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307.

首先，《樹的憂鬱》透過移居臺灣的香港青年的視角，描寫政治流亡者如何在異地尋找新的認同。小說中的角色經歷了語言、文化與身份的多重疏離，突顯出運動後的青年並非全然英雄式的象徵，而是帶著未癒傷痕的個體。梁莉姿透過多重人物的書寫，揭示不同年齡層與社會階層對運動的回應，呈現世代間的價值裂縫與溝通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梁莉姿以「鳳凰木」作為一個世代的象徵，如同書名「樹的憂鬱」表示了這一代港人原本如樹般扎根香港，尤其是「鳳凰木」本是移植而來的。

「鳳凰木」在香港又稱為「森林之火」，原產於馬達加斯加，「林務部最早在1908年種植此樹一百二十七棵，是首度引入。1913由青山道沿路種至坳頭，1914年由沙田種至粉嶺，1915年由粉嶺至大埔墟。在1918年1月，在大埔墟有八百棵因霜凍而死。在香港，鳳凰木由播種到開花要用十年時間。」¹⁷由此可見，梁莉姿藉由鳳凰木的歷史，企圖把「我們的世代」與「上一個世代」的本質差異進行梳理：

「如果焦距模糊，遠看真的好像失火，是不是？其實不只有我們誤會，鳳凰木的英文名是Flame of the forest，據說當年航海家在船上望見它時，也以為森林大火，燒光整個島。後來發現後，便為它改了這名字。」

「不是說香港就是移民之地嗎，它也是一分子，鳳凰木本來是非洲某個小島上獨有的樹。大航海時代，法國人發現了它，把它移植去歐洲。到了十九世紀，英國人又把它從歐洲移到香港，沒想到跨越大半個地球，仍能落地生根，長得好好。」¹⁸

透過鳳凰木的故事，象徵並反思了香港的移民歷史與文化身份。鳳凰木「Flame of the forest」這名稱源自航海家的誤解，誤把滿樹火紅的花朵當作森林大火，這一錯覺透露出人在陌生環境中的迷惘與錯認，也暗喻移民者初至新地的不安與困惑。然而，更重

¹⁷ 香樂思著，彭玉文譯註、攝影，《野外香港歲時記（第二版）》（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4），頁116。

¹⁸ 梁莉姿，《樹的憂鬱》（新北：木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頁125。

要的是鳳凰木的遷徙歷程。從非洲小島被移植至歐洲，再由英國人帶來香港，最終「落地生根，長得好好」，這過程正如香港自身的歷史——一個由不同族群、文化與歷史交織而成的移民社會。鳳凰木不屬於這裡，卻能在異地繁茂生長，象徵著文化的適應力與生存力。更重要的是，作者試圖藉此表現出即便源頭各異，不同背景的人也能在香港這片土地找到位置與歸屬。這不只是對植物的描述，更是對香港身份的詮釋，一種漂泊中仍能扎根、混雜中仍可共存的希望與可能。香港在上世紀作為移民之地，鳳凰木正是其歷史的縮影。雖非本土之物，卻能在異地生根開花，歷經風霜依舊盛放，象徵著遷徙者的堅韌與適應，也反映殖民歷史下的文化流轉與混雜。此外，鳳凰木的「火」，不只是視覺奇觀，也是一種生命的強烈姿態：即使「根」不在原鄉，仍能燒出一片繁盛，如同「上一代」無數異鄉人於香港重新點燃生活的希望。值得注意的是，當阿園因處理移民問題而去到舅父家時，梁莉姿直接把兩代人之間的世代差異，進行了明顯的對照：

舅父看不下去他這樣傷春悲秋，打了根煙：「哎呀你哋呢代真係成碌木噉棟喺度。生得好養得好，根深蒂固，要走不走，舉棋不定，還有閒情逸致打點啊傷感啊猶豫啊內疚啊考慮去哪啊，多奢侈。」

「你看你爸和我這一代，甚麼都沒有，打到來，管它兒女私情家族親情，不跑，死人的。還不是赤條條，說走就走，一下子就來了啊。唉，時代變，你們真特別麻撚煩。」¹⁹

承上，呈現了阿園及其舅父兩代人對「離開故土」與「情感牽絆」的不同看法。舅父代表著上一代人曾經歷戰亂、動盪，他們在生死存亡之際，沒有選擇餘地，只能立刻逃離，不容許多愁善感。他們以「說走就走」的那種毫無包袱的倉皇離開，突顯出「上一代」的果斷與無奈。相對地，年輕一代面對的不是生死存亡，而是生活選擇。他們雖無迫切危機，卻因為生活穩定、情感豐富，對於是否離開顯得猶豫不決。藉由舅父批評不只反映出家庭之間的代溝，也點出不同歷史背景下，移民經驗與情感處理的巨

¹⁹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334。

大差異。這不只是逃亡與選擇的差別，更是價值觀與身份認同的衝突，誠如阿園所想「原來兩代憂鬱的形狀，是不同的」：

這一代的憂鬱，是樹的憂鬱；上一代的憂鬱，是鹿的憂鬱。一隻動物上路，四蹄一躍，就是上了路，光溜溜，幾近無法回頭，無太多行裝，因而遷居至此，忍痛割捨。²⁰

在《樹的憂鬱》裡，提到「這一代的憂鬱，是樹的憂鬱」，可從鳳凰木的生命歷程找到對應的隱喻。不同於「上一代的憂鬱」如鹿般逃離原鄉、奔走異地，「這一代的憂鬱」更像是一棵鳳凰木，從殖民時代被跨洲移植、扎根香港，到承受異地的氣候與環境，歷經十年才開花，如同一代移民，雖已離鄉，卻未能遺忘原鄉。這種憂鬱不再是短促逃逸的疼痛，而是一種長期、深沉、與土地共生共存的感傷。即使能「落地生根，長得好好」，仍不免經歷寒霜之苦，正如1918年曾有八百棵鳳凰木枯死的歷史。鳳凰木成為香港「森林之火」，卻也隱含著這代人的靜默堅忍與內心燃燒不熄的異鄉情懷。這樣的憂鬱是沉默的、延續的，就像樹一樣，在風吹日曬間成長，在異地落地，卻永遠記得來時的路。

至於，在《變成的人》中，主角們歷經運動高峰後回歸日常，逐漸察覺自己與社會的距離，以及理想主義與現實妥協之間的矛盾。小說以多重時間敘事勾勒角色內在的成長與自我質疑，反映出對社會運動後遺症的深層反思。提出了「參與太陽花運動與否」是否能作為一個世代的劃分標誌：

²⁰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334。

我想的是「參與過太陽花運動與否」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個世代畫分的指標。所謂的「世代」究竟是什麼？我們是缺乏想像力的一代，所有想像都貢獻給街頭。批判太容易，反抗太理所當然，抗爭是義務，對世界指手畫腳漸漸變成戒不掉的習慣。你換我，我擾你，之後大家都在換空氣。²¹

所謂的「世代」，通常指的是在特定時期或背景下成長的人們所共同擁有的價值觀、經歷或文化認同。在這個背景下，太陽花運動作為一個鮮明的社會運動，對臺灣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及行動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參與過這場運動，似乎成為了某些人對「當代年輕人」的一個標誌，象徵著他們的政治覺醒與對社會變革的強烈關注。然而，作者進一步探討了這一代人是否因為參與運動而成為了「缺乏想像力」的一代。在批判過程中，我們的反抗與抗爭逐漸成為了理所當然的習慣，而不再尋求真正的創新與突破。運動的能量似乎被消耗在「指手畫腳」和相互換位的過程中，這種模式反而讓人迷失在無窮無盡的對抗中，缺乏了對更長遠目標的展望。同時，也反映出對當代青年世代的一種批判與自我反思，提出了關於「反抗」與「想像力」的問題。世代劃分不僅是行動的指標，更關乎我們對未來的憧憬與建構。可是，當曾經參與其中的承楷而言，試圖「離開社運圈」是脫離過去的煩憂，擺脫年輕時期無法實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並希望通過這個決定重新開始，獲得一種嶄新而被肯定的生活：

他原本以為「離開社運圈」這個決定，會讓他得以拋下大學時期那種永遠做不到言行合一的鬱悶，拋下人際關係與國家暴力等種種回憶，獲得嶄新而受到肯定的新鮮空氣，現實卻是相反的，年資一年一年累積，過去的一切更加清晰，縱使不是凍結成發光的水晶，也風化成獨具紋路的石頭，他對過去的人事物擁有不太一樣的新評價，進而對年輕的自己也有些改觀。²²

²¹ 許恩恩，《變成的人》（新北：木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頁 153。

²²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239-240。

然而，現實卻是相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的經歷並沒有隨著離開而消失，反而愈加清晰，過去的回憶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印象。這一過程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現實，即「時間」無法抹去或消解過去的痕跡。無論是過往的理想、痛苦，還是人際關係的複雜，都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並隨著時間累積而發展成新的理解與評價。對過去的回顧不僅使他對舊有的人事物有了不同的看法，也促使他對年輕時的自己進行反思。這種反思不僅是對理想未能實現的遺憾，更是對過去行為、態度的一種重新認知。同時，也表達了一種成長的過程，不是通過完全拋開過去來獲得新生，而是通過對過去的接受與理解，從而實現內心的轉變。

是以，在《樹的憂鬱》中，通過鳳凰木的比喻，作者反思了香港這個移民城市的文化與身份。鳳凰木經歷了從非洲小島到歐洲，再到香港的跨洲遷徙，它的生命歷程象徵著一代又一代移民者的歷史。儘管鳳凰木不屬於香港這片土地，但它已經生根，並且經歷了層層困難，最終依然能夠繁盛生長，這正如香港社會的歷史背景——不同族群與文化交織，形塑出今天的香港身份。這種身份認同的過程不僅是文化適應的結果，更是不同世代對過去移民經驗的再記憶與再詮釋。此外，小說中舅父與阿園的對話揭示了兩代人在面對「離開故土」這一問題上的巨大差異。舅父代表的是一個在動亂中無選擇的逃亡一代，他們的「憂鬱」像鹿般無法回頭，帶著無奈與倉促；而阿園所在的年輕一代，雖然同樣面臨文化認同的掙扎，卻更多的是處於一個選擇的境地。這種差異體現了社會變革與動蕩的速度如何影響世代的形成與認同，並且使得同一歷史背景下的不同經驗產生了多元的詮釋與回應。至於在《變成的人》中，太陽花運動成為劃分世代的一個指標。參與與否成為一種文化記憶，而這一代年輕人對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參與，反映出他們如何處於一個既有理想，又面對現實的矛盾中。承楷的自我反思進一步展示了世代之間對「過去」的不同理解，從而揭示了世代劃分不僅是行動的指標，更是一個關於理想、現實與自我認知的深層問題。過去的經歷在時間的流逝中不會消失，反而愈加清晰，這正是每一代人在回望過去時，所產生的不同情感與認識。

承上，臺灣與香港的上一代各自嵌入截然不同的歷史結構與記憶體制，其生命經驗不僅決定了他們對政治與遷徙的態度，也構成了後社運世代在倫理與行動上的對話對象。若從歷史脈絡來看，臺灣的上一代多成長於1949年後的威權統治時期，政治高壓與思想審查塑造出「沉默即生存」的倫理框架。這一代人內化了服從與順

從的價值觀，將個體的安穩置於公共參與之前，在經歷白色恐怖、戒嚴與黨國教育之後，「不談政治」遂成為社會性的自我保護機制。相比之下，香港的上一代則源於逃避戰亂與極權的移民經驗，他們在國共內戰後南遷，以殖民地香港作為避難之所，在「務實」「忍耐」與「自我約束」中建立生活秩序。這樣的生存倫理同樣以「不語」為前提，卻來自另一種創傷：對政權逼迫的恐懼與對安定的渴求。這兩種歷史創傷雖屬異質，卻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了相似的結構，即以沉默、服從與遺忘換取生存的可能。也因此，《變成的人》與《樹的憂鬱》中的「後社運世代」，其實是在這種「不語的倫理」之上展開反轉。他們繼承的並非單純的政治記憶，而是一種難以命名的倫理負債：如何在前代的沉默之後重新發聲？《變成的人》藉太陽花運動後的反思，揭示行動者在理想幻滅後仍須面對的「語言責任」；《樹的憂鬱》則讓香港流亡者在他鄉的語言錯置與審查焦慮中，持續辯證「言說」與「噤聲」的界線。相較於上一代的被動順從，這一代以「言說的掙扎」回應歷史創傷，將生存倫理轉化為一種道德行動的延續。

總括而言，兩部小說皆揭示記憶在當代的失落、迴轉與懸置狀態。它們書寫的不只是社會運動的歷史，而是那些曾經試圖參與其中的人們如何在事後的沉默與沉澱中，面對自己作為「這個世代的一份子」的責任與困境。藉由書寫「運動以後」的世代，我們得以理解臺港文學如何捕捉那條斷裂而未竟的世代之線，它不再是歷史本身的紀錄，而是記憶與身份持續協商的过程，也叩問著「我們是誰、來自何處」的核心價值。此外，臺港兩地的文學不僅呈現不同政治歷史下的創傷形態，更透過世代間的倫理轉譯顯示出「沉默—言說—行動」的歷史接續。《變成的人》與《樹的憂鬱》書寫的，正是一種從不語到自覺的轉化過程：臺灣的威權沉默與香港的流亡沉默，在這個世代的作家筆下，轉化為可被聆聽的倫理反思，讓「後社運書寫」成為對上一代創傷的再命名與再語言化，也彰顯臺港文學於時代更迭中承繼與反思的雙重意義。

三、運動「之後」的創傷

社會運動的結束，並不同於情感的止息。相反地，對於經歷過或見證過抗爭的人而言，運動的落幕往往開啟了另一層心理與記憶的糾結。凱西·卡魯斯（Cathy Caruth）的創傷理論強調創傷經歷的「延遲性」，即創傷無法在當下完全被理解或感

知，而是在一段時間後，透過夢境、閃回或重複行為等形式回歸，對個體造成持續的衝擊。因此，「創傷的故事，作為一種遲來的經歷的敘述，遠非講述對現實的逃避——對死亡或死亡的參照力量的逃避——而是證明了它對生命的無盡影響。」²³創傷不是即刻的心理衝擊，而是因為當時無法處理而潛伏在內心，並在未來以不同方式出現，這種「延遲的理解」(belatedness)使得創傷成為一個不斷回溯並無法完全掌握的過程。此外，創傷的真實性並不在於它能否立即被理解，而是它對生命和歷史的無盡影響。創傷經驗並不因無法即時理解而變得不真實，恰恰相反，它的強度體現在它對個體或集體歷史的延遲性衝擊上。這種延遲不僅改變了個人的內心世界，也影響歷史的構建，創傷事件只有在它與其他事件緊密交織時，才真正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並體現出歷史的創傷性。

在《變成的人》與《樹的憂鬱》中，創傷並不主要透過對話來揭露，而是經由詞彙、象徵語言與內心意象的運作，以語言的斷裂與沉默來表現「運動之後」的創傷感。以《變成的人》為例，許恩恩在訪談中提到，小說中某章用「虛構的訪談」形式，包括異國記者與主角以英文交談，語言慢、簡單、節奏緩慢，此處並非真正對話的回應，而是一種語言與溝通的試探，是創傷中對母語與他者語言間不完全貼合的體感。²⁴在《變成的人》中，作者刻意避免在某些情節中用完整對話重現群體內部的爭論或遭遇壓迫的說話場景，而是以敘述者的視角穿插「筆記」、「會議紀錄」或「讀書會筆記」這類不是直接對話但帶有語言使用的片段，這些語言載體之中有省略、有中斷，有未被回答的問題——這正是創傷的語言特質：那種未竟、未被回應、或語言力道不足以承載全部情感的狀態。在小說中的創傷書寫多聚焦於內在心理層面，包括失落、自責、無力感與焦慮。小說描寫社運後青年如何在制度內外游移與自我辯證，以交錯的敘事結構讓角色在回憶與現實間流轉，使過去的運動經驗不斷干擾當下的生活。角色雖離開運動現場，但運動的影響如陰影般籠罩其人生選擇，創傷並非事件後的「結束」，而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生命狀態。其中，主角「我」在回顧過去曾經在參與社會運動時的情況：

²³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

²⁴ 同註6。

「你可能跟運動幹部一起開會，就被說是『黑箱決定』，或者辦活動當總召是『獨攬大權』，或是社團裡面大家負責經營不同議題的『派系鬥爭』，也可能就是你做了一件錯誤的決定，或是誰覺得被你傷害，例如說腳踏兩條船也可以說是一種親密關係上的『獨裁』，批判時詞彙用得太感性也可以說成是一種精神上的『暴力』，然後組織的學弟妹或是新進素人很快學得這一套邏輯就會跟你算從前的舊帳叫做『轉型正義』。反正所有一切，當時有一個萬用的標語，就是『你這樣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²⁵

由此可見，原本為了對抗不公、追求民主的語言，卻被內部用來標籤與攻擊，也揭示了社會運動內部複雜而微妙的權力關係與批判文化，對「運動純粹性」與「道德優越」的理想提出質疑，並指出了運動中的批判語彙與正義論述，有時被操作成權力鬥爭的工具。透過特定語言（如黑箱、獨裁、派系鬥爭等）製造出一種高度敏感、彼此猜疑的氛圍，使得原本應建立在信任與討論基礎上的運動文化，轉變為一種彼此審判的政治場域。深刻反映出運動中的理想與現實張力，提醒我們運動不僅是對外的抗爭，也必須面對內部權力、情感與倫理的複雜交織。此外，小說還反映了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運動中的考量，在決策過程中個人需求優先：

我覺得「搞抗爭的」沒有比其他鑽研什麼事情的要更偉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台灣，還是國外也這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參加運動的實在太多都是夾在個人情感與利益，是符合個人的需求優先。那篇說我們這些頻繁在街頭參與抗爭的人有「高敏感情緒病」，你看我們現在哪個還投入沒有一點精神疾病，就算是低敏感的人也被搞成高敏。²⁶

許恩恩以戲謔但不失尖銳的方式，展現出對當代社會運動參與者內部心理狀態與動機的深刻反思與批判，打破了社運參與者常被賦予的「正義英雄」形象，並點

²⁵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174。

²⁶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233。

出長期參與運動可能帶來的心理耗損與創傷。面對持續性的挫敗、不確定與內部衝突，運動者往往承受極大情緒壓力，甚至發展出精神健康問題。不但反映當代社運內部的矛盾與人性的複雜，也提醒我們應更關注運動者的心理狀態與情緒勞動，而非僅將其符號化為「犧牲者」或「英雄」。此外，運動本身的關注度擴大以後，NGO原本努力耕耘的議題，反而在社會的關注下被掩蓋掉：

因為那時候，你記得你收到割腕的自殘照，血淋淋的紅色，認識的某大學社團成員，對方控訴你的理由即是，太陽花奪走一切對於運動的關注，亦即奪走對方社團努力耕耘的議題所該獲取的關注，而議場內的人如你，象徵著太陽花學運的幹部，該為此負責。²⁷

由此，藉由「割腕自殘照」的控訴揭示了社會運動場域中隱而未顯的競爭與心理張力。當太陽花學運迅速成為社會焦點時，其高度可見性不僅凝聚了廣泛支持，也無形中排擠了其他議題的能見度與資源，導致長期耕耘冷門議題的社團或行動者感受到自身努力被邊緣化、掩蓋甚至否定。對於此一問題，許恩恩曾發表論文，文中探討了2014年臺灣太陽花運動中社會運動組織（NGO）的團結問題，通過社會網絡分析和深度訪談，考察了運動前NGO之間的合作關係以及運動期間的互動模式，並發現太陽花運動的團結並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長期跨議題合作的經驗、共同的「反中」與「民主」框架以及面對危機時的相互扶持之上。「我們NGO」的敘事體現了這些組織獨特的集體認同，並與學生群體形成既合作又有所區隔的關係，亦強調既有的社會運動網絡和行動基礎是太陽花運動得以維持和達成目標的關鍵。²⁸故之，當公共關注轉化為稀缺資源時，原應團結抗爭的群體也可能陷入彼此傷害的境地。透過主角在「運動以後」的回顧，試圖反映出社運行動者在承擔政治角色的同時，也背負著沉重的人際與情緒壓力。無論是否真正掌握決策權，皆因其象徵性身分而承受巨大的道德與情緒壓力，成為他人失落與挫敗情緒的投射對象。

²⁷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265。

²⁸ 許恩恩、吳介民、李宗棠、施懿倫，〈「我們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台灣社會學》第38期（2019年12月），頁1-61。

相比之下，在《樹的憂鬱》一書中，雖然公開資料對其詳細對話結構與章節語言用法的公開摘錄較少，但書介與書評中提及小說刻畫「噤聲無語」與「續存記憶」的心理狀態，暗示語言的失聲與無力。這些描述本身就透過詞彙的選擇（如「噤聲」、「流離」、「憂鬱」）來呈現創傷：這些詞彙不是透過對話中某人說出，而是敘述語言本身的一部分，成為創傷的表徵，更強調外在現實對創傷的放大作用，如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社會輿論的壓力與政治認同的漂泊。小說透過角色之間的張力，揭示港人流亡臺灣後的「後創傷症候群」，並質疑所謂的「自由之地」是否真能包容創傷者。在〈愛人〉一節裡，探討了在政治與文學交織的時代背景下，作家如何處理敏感議題及創作的自由。主角明微提到當前的社會氛圍中，言論和創作受到嚴格監控，尤其是對於參與官方文學活動的疑慮，擔心被「收編」或迎合主流政治。她提到這種情況是一種對自由表達的限制，甚至對作品的創作方式產生了自我審查的壓力。她的教授則提出不同觀點，認為限制和拘束不必然是壞事，作家應該在有限的空間中尋找創作的策略和突破，專注於如何以巧妙的方式表達真實的思想，而非過度擔心不能說什麼。這反映了作家在極權或限制性環境下，如何依然能夠保持對真實的表達與藝術的忠誠：

她吞吞吐吐問編輯朋友，有關這題材，會不會有甚麼「敏感」部分及字眼，是可能要修訂或不能出版的，假若日後出版社要求刪改，作者有多大權力拒絕？

編輯朋友稍頓，平實回應：「我剛剛想了一會，我不太明白這「敏感」定義是甚麼？有甚麼是不能出版的？」²⁹

在這裡，明微對「敏感」的定義來自於香港出版環境中，審查標準的不確定性與自我審查。這種「敏感」的模糊性使創作者無從掌握界線，只能不斷揣測與自我約束，進而扼殺創作的主動性與實驗精神。這種情境不僅是明微所面對的個人焦慮，更是對制度化的不安，讓創作變成一場避雷遊戲。小說藉由呈現出在反送中運動以後，

²⁹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42。

在自由與審查夾縫中創作者的掙扎與無力，也說明了在面對「敏感」議題時，所經歷的不僅是文字層面的斟酌，更是一場與體制與社會氛圍的持續博弈，甚至成為難以抹去的陰霾：

「我覺得，在我們這年代，因為旗幟立得太鮮明絕對，容易有種近乎潔癖的獵巫。」明微說：「譬如說，近年若有甚麼公眾人物還會為政府機構代言的話，網絡上很快就會冒起一股要求封殺、抵制的聲音。同樣地，這幾年，我不太敢再參加香港官方辦的文學獎或文學活動，怕有種收編或要配合主旋律的意味。」

「這是相當任性奢侈的說法呢。」教授脫下眼鏡，抹抹鏡片。³⁰

承上，明微所提到的「潔癖的獵巫」表現出當代社會中，對於個人立場和價值觀必須清晰地表明與界定，這使得一些人或機構一旦與官方或主流立場有所關聯，就會迅速成為攻擊的目標，並提到自己不敢參加香港官方辦的文學獎或活動，正反映了她對於文化活動中「收編」和「主旋律配合」的敏感性。在這種環境中，參與某些官方活動可能被視為對現有政權或官方立場的附和，從而使得參與者難以保持獨立性和創作的純粹性，「當文藝成為國家政治工具，怎樣調整書寫策略，去偷渡真正要說的話，是很多作家的重要課題。」³¹這種現象揭示了當代文化與政治的交織，尤其是文化人面臨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作為公民或創作者，保持獨立思考和表達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某些時刻，官方的影響力卻可能讓這些自由受到限制。

此外，在《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中，「多重敘事時間」不僅為敘事結構上的技巧，更是處理創傷、代際關係與身份重構的核心策略。兩書皆並非單線性敘述「社運之後 → 當下 → 未來」，而是在「過去／回憶」、「當下的存在狀態」與「未來的可能性／恐懼」之間，交錯並置。在這兩部小說裡，藉由角色的回憶（閃回）中斷當下情境，不僅重現社會運動中受壓迫、被失落或被迫離去的情感，也反

³⁰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46。

³¹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46。

襯出當下主角在制度、身份與世代裂縫中的困境；而預示或未來想像的片段，常邀請讀者思考，如果理想未能實現、制度未被修正，未來或許會如何。這樣的時間重組一方面使過去的歷史記憶得以進入當下的主體經驗，另一方面也使當下的不穩定性與未竟之情被強化。

在《變成的人》中，這表現為多篇章節以不同時間點與敘述角度交錯，代與代之間（父母／長輩 vs 主角自身）的敘述共同形塑記憶與創傷；在《樹的憂鬱》裡，「2019年後」的當下狀態與對離去、噤聲與語言失能的回憶（或對代際的寓意回望）並行，時間結構因此呈現斷裂又持續的張力。敘述中過去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想像往往和「現在」並列存在，甚至「現在」被回憶與預期所干預。這樣的安排讓文本不只是呈現已發生的事，更是一種對時間經驗本身的反思。敘述者可能因歷史、創傷、政治記憶，而在「現在」中被迫回望或展望。通過這種多重時間敘事，小說不僅記錄「運動之後」的生命經驗，更使讀者得以感知：記憶並未消逝，創傷與政治裂痕在不同時間層中相互照應；未來既受到過去的牽引，也承擔當下的不可確定性，從而凸顯個體與集體、世代與身份之間動態的倫理責任與歷史重負。

簡言之，《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並未將社會運動作為小說的核心，而是將焦點放在後續創傷的幽微展現與倫理責任的思考。創傷不僅是被敘述的對象，更是生成文本本身的方式，正如Caruth所認為創傷的敘述不在於還原事件的真實，而是讓未被理解的經驗得以重返。透過這些虛構角色的創傷，我們得以看見當代臺、港青年在運動退場後的內在傷痕，一種難以被歷史承認，卻仍須被記得的真實。同時，兩本小說中創傷書寫透過語言的「斷裂」「沉默」與象徵性詞彙，而不是透過對話的完整對抗場面來揭露——這樣的書寫策略使讀者感受到創傷不只是一場公共事件的回憶，更是一種語言與情感不能完全被翻譯／對話的內在狀態。這也強化創傷的倫理與時間維度：過去沒有被完全說出，未來尚未被回應，當下被言語與沉默糾纏。

四、「臺港共同體」的反思

在臺港兩地社會運動後，不少輿論將兩地的抗爭經驗並置，強調「命運共同體」的連結。然而，《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都對此提出質疑與修正。許恩恩在《變成的人》中揭露即使在臺灣內部，社運世代之間亦存在價值觀落差與理解斷層；而

梁莉姿則從港人「被包容」的視角出發，指出兩地在歷史脈絡、政治經驗與文化認同上的差異，使得「共同體」的建構顯得複雜而多層。因此，在探討《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這兩部作品時，不能忽略其對「臺港共同體」想像的質疑與顛覆。此一共同體說法，從2014年臺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反國教運動漸漸作為對照案例，一直到2020年反送中運動的輿論與文化論述中被積極建構，象徵兩地青年因共同反抗威權、追求自由而產生的認同連結。³²然而，這種共同體在運動之後的現實中，逐漸顯現出其脆弱、錯位與差異，其中《樹的憂鬱》不僅描寫個人的情感與心理狀態，也反映出香港與臺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交織與碰撞：

……時值立委選舉，連外出都能看到飄揚的宣傳旗幟，一張張催淚彈爆破的新聞照片，配上候選人名字和口號：「保臺抗中」、「挺自由、撐香港」、「臺灣反親中」；造勢大會上，人們冒著冷寒大喊支持香港的口號，挺人權，反暴政。

妳卻不再認同團結的意志能推倒高牆，不就是因相信復又失敗，才會倉皇逃落至此嗎？³³

在2020年臺灣總統選舉的過程中，充斥著強烈的政治標語，這些口號不僅強調了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對立，更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相連結，反映出臺灣社會對自由、

³²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最初在 2014 年太陽花運動期間興起，作為警示臺灣若在兩岸經濟或政治整合中失去對透明程序、言論自由、制度自主性的掌控，可能步上香港在主權移交後所面對的自由及民主倒退路徑。該口號在當時具有高度預警作用，促使臺灣社會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過程與潛在後果進行質疑與監督。爾後，此一口號在臺灣與香港間的使用出現斷裂與差異。其一，「今日香港，明日臺灣」被一些政治力量使用或政策動員化，如在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及其後的臺灣選舉中，被用作強化反中立場與鼓動「身份認同」的工具，常與「一國兩制」方案對比，塑造台灣選民對中國威權威脅的恐懼感；其二，該口號在語義上存在誤用。許多人未能區分香港與臺灣在憲法地位、國際法律地位、法治結構等方面的根本差異，而把香港的遭遇作為臺灣可能命運的直接預言，用情緒化比喻來強化「亡國／被併入中國統治」的可能性，忽略臺灣在民主制度、國際社會支持與內部政治動力上的差異性。這導致該口號在某些場合成為恐懼動員（fear mobilization）而非理性公共討論的語言工具。最後，對於香港社運參與者而言，臺灣對這口號的使用有時被視為「符號共情」或政治利用，而未必深入理解香港複雜的制度壓力與法律實際狀況。

³³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57。

人權的強烈訴求。這些活動中的「團結意志」似乎是一種抵抗力量，能夠反映出人們對未來的渴望與抗爭的希望。然而，主角真真經歷了香港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失望、挫敗，對於團結與抗爭的力量感到懷疑。這種懷疑源於過去的失敗與無力感，當曾經的努力未能實現目標，反而可能讓人們感到倉皇與無奈，甚至質疑是否真的能夠依賴「團結」來克服這些高牆。不僅是挑戰了集體運動的理想化，也表達了對理想未能實現的失落，並質疑在充滿衝突與對立的時代中，是否仍能依賴過去的力量來推動變革。

另外，在《樹的憂鬱》裡，也可發現梁莉姿自身作為「他者」的書寫思考，尤其是當一個香港人要書寫臺灣的正當性，「要怎樣描述一個符合臺灣人想像的臺灣？作為外來者，我們足夠政治正確嗎？我們有足夠的立足點和資格去書寫嗎？」³⁴這不僅涉及政治正確性，更關乎身份認同和文化經歷的認同感，挑戰了外來者是否能夠恰當地把握臺灣的多元面貌與內在複雜性，甚至因為反送中運動而促使以「香港」為主題的相關出版，得到一定程度「特別待遇」：

這幾年，「香港」兩個字似長滿細刺的器皿，盛載甚麼不重要，底裡材質不重要，重要的是誘人、刺激又危險。不敢用的，端詳一番，好奇卻難為外人道；不怕的，灌進去，填滿想像，甘之如飴。幾年間報道、影視、訪問、音樂、藝術、出版物，百花齊放，有市場，自然有代言，有特別待遇。³⁵

承上，在以往臺、港之間可能有較為緊密的文化交流和情感連結，但隨著香港政治局勢的劇變，這一想像被顛覆。香港在過去的輝煌與當前的動盪中，成為了一個充滿矛盾的象徵。那些對香港的情感不敢接近的，反映了對這片土地和其政治動盪的不確定感與恐懼；而敢於接觸的，則將香港的情況轉化為一種具吸引力的想像與符號，將其包裝成某種文化商品，並透過媒體、音樂、藝術等渠道進行再創作與消費。這些媒體與文化產物「有市場，自然有代言」，表面上看似關心與支持香港，

³⁴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50。

³⁵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27。

但實際上也反映了當代臺灣對香港的感情並非簡單的共同體想像，而是一種高度商業化、符號化的理解。這種文化消費的過程，使得臺灣與香港的連結逐漸變得表面化、碎片化，不再是過去那種深厚的政治與情感連結，反而更像是一種關於香港的「想像」與「商品」，並且充滿了危險與誘惑，遠比實際的「香港」本身更具吸引力。對此，挑戰了對「臺港共同體」的理想化想像，顯示出隨著香港的政治變遷，臺灣對香港的情感與認同逐漸從一個具有共同歷史背景的實體，轉變為一個複雜且充滿誘惑與矛盾的文化符號。同時，除了「香港」成為了一種媒體與文化的產物，還賦予「香港」不同的標籤：

這幾年，臺灣之於香港，很多人拋出名詞指向，共同體、避風港、烏托邦，但這些詞語的內核是甚麼，沒人搞懂。要展示一地的苦難，市場不夠大，受眾不夠廣，只好把脈絡和殊異削鈍，好使形狀矩平，方便嵌接更廣義的價值。好比為了促銷蛋品，把明明大小不一的雞蛋、鵝蛋、鴨蛋，連鳥蛋都放在一起，統統歸納為「脆弱的蛋」。³⁶

藉由表達了當代臺灣對香港的關懷與想像中的矛盾性，特別是當涉及到「共同體」、「避風港」、「烏托邦」等概念時。雖然這些詞語表面上表達了臺灣對香港的支持與情感連結，但其內核卻常常是模糊與未曾深入探討的。臺灣社會以這些簡化的名詞來概括香港的處境，將香港的困境轉化為一種可以被普遍理解和消費的情感符號，卻忽視了其中的複雜性和差異。這樣的簡化操作讓臺灣對香港的認知更加表面化，呈現的是一種情感上的符號消費，而非深入理解香港真實情境的努力。這也突顯了臺灣社會對香港的同情與支持，更多的是基於情感認同與價值觀的契合，而非基於對香港多樣且複雜的政治、社會歷史的真實理解。

³⁶ 梁莉姿，《樹的憂鬱》，頁 230。

至於，在當代臺港關係的思索中，許恩恩的《變成的人》揭示了世代與地域之間對危機感知的深層落差。正如Eartha與「我」在戰爭預測上的歧見，臺灣人對地緣優勢與國際支持寄予希望，而來自香港的Eartha則因親歷威權逼近而格外敏銳與悲觀：

Eartha跟我不同，早在那時，她不只一次提到，台灣遲早會被中國入侵，戰火是遲早的問題，「不能心存德僥倖，」我卻總回說，台灣是個獨立的海島，跟香港畢竟不同；即使局勢趨於嚴峻，那也是機率極小的結果，「不會真的打，至少不會那麼快。」³⁷

在這裡，兩人分別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方面是對即將來臨的危機的警覺與不安，另一方面則是對現狀的安穩以及對未來可能性的低估。這種觀點上的差異，反映出不同個體在面對政治與軍事衝突時，對未來的預測與心理承受能力的差異。作為香港人的Eartha的悲觀觀點源自對兩岸關係緊張局勢的深刻憂慮，而作為臺灣人的「我」則以樂觀態度面對臺灣的地理位置與國際支持的信任，並認為衝突的發生並非立刻迫在眉睫，明顯反映出臺港之間面對同樣的議題時，相互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看法與認知。儘管在《樹的憂鬱》和《變成的人》皆對於「臺港共同體」進行自我辯證，但其並不是全然反對此一論調，反而提醒我們不要流於片面的、口號式的層面，不能忽視臺、港兩地之間的複雜情況和其差異性，承如《變成的人》裡，Eartha所說：

³⁷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 50。

以帶有粵語口音的中文，Eartha說：「每次看海的時候，我都會想到在書中讀到的一段話，意思是類似說，我們受海洋吸引，凝視著海洋，是有原因的，因為比起鏡子，海洋更能反映出，我們是誰，來到這裡，我感覺大家就像是很想要傳遞這一件事情，就是我們都是同一片海洋。」³⁸

從Eartha這段話可見，海洋不僅是自然景觀，還是一種心靈的映照，能夠激發人們對自我和他人的認識，並且是連接人類情感和共鳴的載體。海洋不僅代表地理的連結，更象徵著人們之間無形的關聯與共同體的精神。這樣的理解反映出一種深層的共鳴，表明無論文化、背景如何，人類對海洋的感受都能跨越個體的差異，凝聚成一種共享的情感與認同。由此，海洋作為連結香港和臺灣的載體，提供了一種對話的空間，讓不同經驗與歷史能夠相遇、碰撞，進而生成新的意義。它是一種包容的力量，也是一種挑戰我們固有界線與身分認同的媒介。在這樣的象徵下，臺港之間的連結不再僅是政治或文化的策略性想像，而是一種經由共感與理解逐漸形成的深層聯繫。這也提醒我們，唯有在尊重彼此差異，和更深入理解相互實際複雜的歷史與社會情況下，共同體的可能性才得以真實地展現與持續。

總括而言，兩部作品皆拒絕將「臺港共同體」浪漫化，並指出：真正的連結來自於差異與裂縫之中，而非齊一性的認同投射。不僅打破了單一敘事，也使「臺港共同體」轉向為一種批判性的再思，面對差異與傷痕，才能重新構築跨地域的連結與理解。這樣的書寫不只是去神聖化，更是一種重構想像空間的實踐。在後社會運動的語境中，兩部小說提示我們：臺港關係不再是單一政治事件的反映，而是由歷史記憶、文化期待與身份不確定性所構成的複雜結構。在這個結構中，真正重要的，也許不是「我們是否一樣」，而是「我們能否在不一樣之中，仍選擇共在」。

³⁸ 許恩恩，《變成的人》，頁101。

五、結語

本文以《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兩部小說為討論主軸，探討臺港兩地在社會運動發生之後的文學書寫，兩部小說作為當代臺港後社運書寫的重要文本，揭示了運動之後的多重現實：個體心理創傷、世代價值裂縫、跨境文化衝突，以及共同體建構的思考。同時，可看出兩位作者透過其作品——「既是對歷史的追問，也是對未來想像的投射」——使「後社運」不只是時間上的「之後」，更是存在狀態的延續與重構；誠如上文提到梁莉姿與許恩恩的文本不單是對歷史的追問與未來的投射，也在敘事上深刻著重「當下／此時」的張力與矛盾。小說中的多個場景並非僅在重返過去或構想未來，而是透過角色對運動記憶的即時反思、內心自問，以及在日常語言與符號中顯現的焦慮與猶豫，讓「現在」成為敘述的焦點。這些小說通常不將主體的反思安排在「回顧式」的段落，而是讓角色在生活當下、對話或敘述的中縫裡自覺地停頓、揣摩、顫抖。這也意味著，當下不是一個靜態的終點，而是一種不斷被創傷牽動、被歷史與未來牽引的張力場。若我們在討論文本策略時充分帶出這種「現在性」的視角，便能更全面理解兩部小說如何將「運動之後」化為不斷在時間中被重構的過程，而不是時間軸上的靜態節點。

因此，後社運書寫一方面是再現傷痕與失落，另一方面嘗試將創傷轉化為歷史記憶、公共經驗與文化符碼，正如皮耶·諾哈（Pierre Nora）認為「我們要追問的不是傳統，而是它如何被建立、被傳承。總之，不是死後復活，不是重建，甚至不是再現，而是一種再記憶。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³⁹而「再記憶」並非個人懷舊式的回憶，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性的記憶操作，是現代對過去所進行的詮釋與再建構。臺港文學在此過程中所展現的，不只是政治立場與社會批判，也是一種文學美學與倫理的選擇。

此外，《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不僅記錄「運動之後」的沉默與餘震，更為社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思考與對話的空間。本文以「後社運」書寫為討論主軸，除了反映書寫「之後」，還是面向「未來」的重新出發，尤其是「後社運」書寫不應僅被

³⁹ [法]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頁 19。

視為政治運動的附屬產物，而是深具文學價值的反思載體。透過《樹的憂鬱》與《變成的人》的對照下，我們得以理解文學如何在創傷與轉變之中，承載個人與集體的記憶，並推動文化與政治的對話，更冀以未來相關研究可擴展至其他語系與地區，進一步探討「後社運」書寫的全球性語境與在地性實踐。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法]皮耶·諾哈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 Nora, Pierre, ed. *Realms of Memory I*. Translated by Li-chuan Tai. Taipei: Flâneur Culture Lab, 2012.
- 沐羽，《煙街》，臺北：木馬文化，2022。
- Mu, yu. *Perhaps in the Smoke*.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2.
- 林于玄、陳湘紓，《傷兵不在街頭》，臺北：木馬文化，2024。
- Lin, Yu-hsuan, Zoey Chen. *The Wounded Are No Longer on the Streets*.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4.
- 香樂思著，彭玉文譯註、攝影，《野外香港歲時記（第二版）》，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4。
- Geoffrey A. C. Herklots. *Hong Kong Seasons Throughout the Year(2nd edition)*.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Yu Wen Peng.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Hong Kong), 2024.
- 梁莉姿，《樹的憂鬱》，新北：木馬文化，2023。
- Leung, Lee-chi. *The Melancholy of Trees*. New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3.
- 許恩恩，《變成的人》，新北：木馬文化，2024。
- Hsu En-En. *The Becoming*. New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4.
- 蘇朗欣，《觀火》，臺北：木馬文化，2024。
- So, Long-yun. *Watching the Fire*. Taipei: ECUS Publishing House, 2024.
-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Ho, Ming-sho and Thung-Hong Lin, "The Power of Sunflower: The Origin and the Impact of Taiwan's Protest against Free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Civil Resistance and Contentious Space in Hong Kong*, edited by Ngok Ma and Edmund W. Cheng, 279-310.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9.

Karl 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2.

二、期刊論文

周嘉浩，〈傷痕文學視角下的後社運香港流行曲：沉默、抒情與暗碼書寫〉，《臺灣傳播學刊》第 45 期（2024 年 6 月），頁 109-145。

Chou, Chia-hao. "Post-Movement Hong Kong Pop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r Literature: Silence, Lyricism, and Encoded Writing." *Taiw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 45 (June 2024): 109–145.

許恩恩、吳介民、李宗棠、施懿倫，〈「我們 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臺灣社會學》第 38 期（2019 年 12 月），頁 1-61。

Hsu, En-en, Chieh-min Wu, Zong-tang Li, and Yi-lun Shi. "'Our NGO': Network Relations and Movement Solidarity i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Taiwanese Sociology*, no. 38 (December 2019): 1–61.

黃文倩，〈唯情與不潔：臺灣解嚴後女性知識份子的社運敘事與主體困境——以邱妙津〈寂寞的群眾〉、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為例〉，《第十三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 年 12 月），頁 398-431。

Huang, Wen-chien. "Emotion and Impurity: Post-Martial-Law Taiwanese Female Intellectuals' Movement Narratives and Subjectivity—Case Studies of Chiu Miao-jin's *The Lonely Crowd*, Lai Hsiang-yin's *The Translator*, and *Afterward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398–431. December 2013.

黃宗潔，〈躁鬱的城市：當代香港推理小說的社會性及其「雙重轉譯」〉，《淡江中文學報》第 43 期（2020 年 12 月），頁 239-273。

Huang, Tsung-chieh. "Bipolar Cities: The Social Nature and 'Double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Detective Fiction." *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43 (December 2020): 239–273.

賴展堂，〈冤魂政治：以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文學寫作為例〉，《文化研究季刊》第 178 期（2022 年 7 月），頁 69-96。

Lai, Chan-tang. "Politics of Vengeful Spirits: Social Movements and Literary Writing in Hong Kong."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no. 178 (July 2022): 69–96.

謝樺瑩，〈肉身其中的倖存者——析賴香吟〈翻譯者〉與《其後それから》〉，《雲漢學刊》第 46 期（2023 年 10 月），頁 110-143。

Hsieh, Hua-ying. "Survivors in the Flesh: Analysis of Lai Hsiang-yin's *The Translator* and *Afterwards Sorekara*." *Yunhan Journal*, no. 46 (October 2023): 110–143.

Charles K. S. Wu, "How Public Opinion Influence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3 (2019 年 11 月): pp. 289-307.

三、電子媒體

〈2024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完整得獎名單與評語〉平路《夢魂之地》榮獲金典獎年度大獎〉(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890>，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2024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Golden Prize: Complete Winners List and Comments—Ping Lu's *The Land of Dream Souls* Wins Grand Prize of the Year." OpenBook. Accessed May 10, 2025.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890>.

張馨文，〈從社運組織者及研究者，變成寫小說的人：訪《變成的人》許恩恩〉(OpenBook 閱讀誌：<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631>，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Chang, Hsin-wen. "From Social Movement Organizer and Researcher to Novelist: Interview with The Becoming Person Author Hsu En-en." OpenBook. Accessed May 10, 2025.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9631>.

虛詞編輯部，〈廖偉棠《劫後書》、梁莉姿《樹的憂鬱》榮獲臺灣第 48 屆文學圖書類金鼎獎〉（虛詞：<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4748.html>，檢索日期：2025 年 5 月 10 日）。

Heteroglossia Editorial Team. "Liao Wei-tang's After the Disaster and Liang Li-zi's Tree of Melancholy Win Taiwan's 48th Golden Tripod Literary Awards (Book Category)." Heteroglossia. Accessed May 10, 2025.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4748.html>.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Trauma Representation in Post-Social Movement Narrativ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Melancholy of the Tree* and *The Becoming*

Yu, Ming-Sheung*

Abstract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in Taiwan and the 2019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in Hong Kong mark pivotal turning points in recent social mobilizations across both regions. These movements not only awakened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younger generations but also reshap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ajectories. In the aftermath, a significant body of writing has shifted toward life after protest, foregrounding themes such as traumatic memory, exile and displacement, intergenerational rupture,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identity. Together, these works gradually delineate a mode of “post-social movement writing.” Notably, beyond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or future projection, the narrative importance of the “present moment” has grown, yet remains underexamined in existing scholarship.

In response, this article takes Leung Lee-Chi’s *The Tree’s Melancholy* and Hsu En-En’s *The Becomings* as primary texts to examine how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reartic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within a post-movement context. Through strategies of temporal reordering, linguistic fracture, and innovative narrative forms, these works reconstruct experiences of trauma, generation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the wake of political rupture. Both texts further interrogate a central question: when a movement ends and ideals collapse, how do individuals re-position themselves? And how does literature mediate, inherit, or transform emotions and histories that remain unresolved?

Ultimate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literature functions as an ethical practice, illuminat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 intergenerational memory, and the imagin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rough this lens, the study outlines a more critically engaged and transregional pathway for conceptualizing a “post-social movement literature.”

Keywords: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post-social-movement writing; historical memory; trauma representation; Taiwan–Hong Kong cultural community

* Ph.D. stud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ceived: August 29, 2025; Accepted: October 31, 2025)